



人老了,诸事皆废,闲着也是闲着,用手机看看短剧,听听小说,已成了我生活中的常态。就那么半倚半躺地瘫在沙发上,面对屏幕,体能降为零,智商降为零,不图收获,只求舒服,有时睡着了都不知道。可有一天忽然听到这么一句话:“命运命运,人的命运,命是定数,运是变数。年轻时向前看,皆是变数,未来可期;年老后回首望,竟是定数,全都命中注定。”我竟如醍醐灌顶,感叹不已。别人我不知道,我的这一辈子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比如上大学,我的经历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1958年,我顺利升入初中,当时我们初一教室的后面,正好是高中部教室。初一和高三,本是中学阶段相距很遥远的两个顶端,可由于我们的教室靠得太近,我们和高三的同学就不时相遇了。相遇的地点是我们教室东墙外的一个露天小便池。当时大家早晨都是吃的稀粥,第一节下课的头等大事,就是迫不及待地放水。高三的同学自然也首选我们这个小便池,于是在一阵酣畅淋漓之后,我们嘻嘻哈哈地也认识了不少高三的同学,甚至还给有的人起了绰号。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来年暑假过后,我们认识的这些高三同学,却不断有他们的好消息传来:某某考到北京去了,某某考到上海去了,好像最不济的,也去了离家最近的扬州师范学院。这些消息对我触动很大。在整个小学阶段,我懵懂无知,浑浑噩噩,不知道学习,正是这些消息,在不知不觉中激发了我的学习欲望,让我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性。我这个小县城的穷孩子,要想走出去,只有上大学这唯一一条路。有了这个觉醒,两年之后我终于坐进了后面那排我向往已久的高中教室。

进入高中,自然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目标只有一个,考大学,到北京去,到上海去,到大城市去,对未来充满期望。我雄心勃勃,自觉成绩还可以,上个普通大学不成问题。可最后的事实是,我名落孙山,铩羽而归。我以为自己考砸了,愿赌服输,老老实实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可多年之后,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原来像我这种人的档案上,早就写上了“此生不宜录取”几个字,原因很简单,家庭出身不好,是地主成份。关于这个成份,我一直莫名其妙。我的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家庭妇女,祖父是地主与我何干?从必须填写这类存档表格以来,我在家庭成份一栏里,一直填的是职员,在小学和初中都没问题,怎么到高中就在后台操作中变成了地主?后来我和同命运的几个同学谈起此事,才明白那时已开始大抓阶段斗争,宁左不右,我们这些最低层的小蚂蚁,只能自认倒霉。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我生命中的至暗时刻也就此开始。大学不能进,下放却不能少,高中毕业后,我很快被下放农村当上了农民,并且头上还多了一顶帽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帽子重啊,估计当年压在孙悟空身上的五指山也不会有这么重。记得当年为了改造自己,我积极参加国家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吃得苦耐得劳,一起干活的农民想推荐我当“三好水利战士”,可带队的头头立即就很不诚实地否定了:“吴毓生表现不错,

变数和定数

□ 吴毓生

但家庭出身不好,报上去也不会批,白浪费一个名额,还是换个人吧。”我听了摇头苦笑,在心底深深叹了一口气。一个“三好水利战士”的荣誉,不过一纸语文书大小的奖状,过了这个村谁也不会记得,竟然也是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可得到的,这是怎样的“可以教育”啊?于是在这个“可以教育”的身份下,城市对知青招工了,没我份;大学对知青招生了,更没我的份。转机是在1971年,国家开始宣传计划生育,我为大队编排的一台文艺节目,反响很好,终于立功有赏,获得了一个民办教师的名额。我的生活总算暂时安定下来。至于上大学,虽然仍偶有所想,但终究不是我的菜,还是一别两宽,永远拜拜吧!

然而,就在我对上大学彻底绝望后,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那是1977年秋天,学校正在放秋忙假,我们教师都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劳动,场边绑在树上的高音喇叭,在播过几首久违了的歌曲后,忽然就播出了一条天翻地覆的新闻:国家从这个秋天恢复高考,所有有能力的应届往届毕业生,不计年龄,不论婚否,不分出身,只要没有重大政治问题,都可报名参考。对于我来说,这无疑是个漫漫寒冬后的一声春雷,震得我早已深埋于心底的那颗要上大学的种子,竟在一瞬间苏醒,破壳,发芽,不可阻挡地长出青枝绿叶。我抬头看天,天蓝蓝的,深邃而高远,明亮纯净的阳光无遮无碍地洒下来,洒在地上,洒在树上,洒在房子上,到处都升腾着热气,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我心里很兴奋,立即和场上同是高中毕业的几个知青教师议论起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回城机会,而且不需要托关系走后门,完全可以搏一搏,赢了最好,输了也不算输,没有任何损失。于是秋忙假一结束,我便急急忙忙赶回城,从床肚里把那些发霉了的高中课本翻出来,包包扎扎带下乡重温恶补。由于离考试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没日没夜地复习着,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看书上——那真是拼命的两个月,很苦很累,但心里却充满希望和阳光。上大学,上帝早给我把这扇门关上了,现在却突然打开了这么一扇窗,我再不努力跳出去,那就怪不得任何人了。

报名果然很顺利,没有任何让我头疼的政审。填报志愿也很简单,我靠船下篙,很务实地填了离家最近的扬州师院中文系。什么去北京上海,不去做那个梦了,先跳出“农门”才是最重要的。考试分两次,由于积十年之久,报考的人太多,必须先预考淘汰一部分,剩下的人一个月后再复考。这种先后两次的高考模式,好像建国以来仅此一次,也算是空前绝后了。预考那天,考生如潮,明显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近一二年毕业的小年轻,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些下放老知青了。老知青的脸上满是沧桑,也满是坚毅和期待。我在他们当中看到几个熟人,互相点头一笑,什么话也没说。在这

即将敲叩命运大门的时刻,什么语言都是多余的。我相信命运会赐福于我们,让我们苦尽甘来。

接到扬州师院的录取通知书,已是来年二月。二月里来风光好,这个1978年的二月,在改革开放的前奏中,阳光和煦,春风浩荡,似乎格外美好。那天我手攥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仿若梦中。从我1964年第一次参加高考算起,这张录取通知书姗姗来迟,整整延宕了十四年。这期间,上苍没给我一点上大学的机会,也没给我一点招工的机会。上苍明白,如果当时怜悯我,让我招工到城里哪怕是一家很小的工厂,我便贪安逸,再也不会来参加这次劳心费力的考试,从而永远与大学失之交臂。上苍的安排就是要让我出身不好,就是要让我在该上大学的年龄,坠入深谷,饱受苦难,然后逼着我慢慢朝上爬,在过了上大学的年龄,给我送来这张录取通知书。——在哲学上,这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可在《西游记》中,这就是命,这就是命里的定数和劫数。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人生,也许真的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可唐和尚的磨难,是如来、观音特意安排的,我这磨难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去年,我们一群六十年前毕业的高中同学,进行了一次纪念聚会。几十个人相聚一堂,个个都老得不堪入目,令人唏嘘。其中也有不少当年考上大学的,跟他们聊起来,他们后来的境遇好像也不比我这个当农民的知青强多少。比如一个考上清华的李同学,毕业后分到了陕西铜川的一个广播站,却因文革中造反而被孤立监视,很长时间得不到重用。再比如一位考上农学院的王同学,毕业后分配到新疆,离家十万八千里,犹如另一种形式的下放,多少年后才调回南京。这么聊着聊着,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一切都以1976年为分水岭,之前无论是他们出身好考上大学的,还是我这个出身不好下放的,日子过得都不轻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来临,大家的生活才都安定下来,活出滋味,活出傲气。再扩大一点说,当年我上大学后,那些还留在农村不能招工不能上学的知青,也都很快被安排回城就业了。我下放的农村也因包产到户,家家再也不用为吃穿发愁了。还有,右派平反了,出身成份取消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面貌,就这么焕然一新了;日子,就这么蒸蒸日上。细细一想,我忽然又悟到了另一点:什么命运啊,从微观上讲,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性,确有变数和定数,但从宏观上讲,个人是渺小的,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命运其实是紧密相连、同脉共振的。国家好,我们就好;时代苦,我们也不会甜。从1976年起,我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不都是因为国家拨乱反正,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吗!

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发展几千年,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绝对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最伟大、最辉煌、最值得骄傲自豪大书特书的时代。

这就是国运,是时代的定数,也是历史的必然!

的米粒在淘箩子里滚来滚去,发出“哗哗”的声响,我便催促母亲快点将米下锅。母亲扬起嘴角笑了笑。不一会儿,蒸腾的水汽和糯米香从锅沿溢出。我忍不住偷偷打开锅盖一看,那糯米渐渐变得晶莹剔透,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妈妈大声喊:“小馋猫,饭还没煮好呢!你一开锅,饭就会夹生的。”我吓得赶紧盖严锅盖。我知道,夹生饭半生半熟,不好吃的。于是我就在灶台前转来转去。饭刚好,母亲就先盛了半碗让我吃起来。

母亲帮我解馋,不只是一顿糯米饭,冬天里还将糯米碾成米粉,做糍粑、包汤圆,端午节还用糯米裹粽子,过春节还要蒸年糕、酿米酒呢……

如今,父母走了,我只能从超市里买回糯米或米粉。那包装再精美,也寻不到当年沾着稻壳的糯香。原来秋风里的糯香,早和父母的爱一道,黏糊糊地粘在我温暖的记忆里了。

抗震遇险记(外一首)

□ 雪安理

1976年大运河抗震宣传队演员,
先后为两万多民工演唱出征。
一群姑娘和小伙子们,
下午坐水泥船去马棚。
他们在船上说说唱唱,
运河上响起阵阵歌声。
深秋的天气突然变幻,
电闪雷鸣后暴雨倾盆。
强风硬性堵住了小舟,
风浪中有翻船的可能。
离目的地只有几里路,
危险始终笼罩着我们。
船上机器又发生故障,
那时无手机报警通讯。
我呼唤大家切莫慌乱,
相互手拉手静坐求稳。

熬到了风平浪静
修好机器,
队员们庆幸自己死里逃生。
下船后住宿在清水潭边,
防震棚内点亮了煤油灯。

民工们送来了晚餐,
慈姑烧肉香味诱人。
男女和衣当晚各睡一侧,
我是队长担任值班守门。
他们好像刚入伍的战士,
服从命令又十分的兴奋。
清晨为几百名民工演出,
又乘坐大型拖拉机返城。
队员每次演出没有报酬,
一切都是为了防灾抗震。
如今队员们当上爷爷奶奶了,
四十九年又聚会把往事重温……

人生两朵花

人生两朵花,
朝阳和晚霞;
青春成往事,
夕阳会西下。

挫折信步走,
困苦咬紧牙;
热恋乡土地,
胸怀大中华。

人生两朵花,
好好珍惜吧;
青春结硕果,
夕阳梦奇葩。

高邮湖的落日(外二首)

□ 陈祥

高邮湖的落日
以前看的人少
但这很少的人
心思很轻
看,一只水鸟划破
落日
鱼儿在霞光中眩
晕战栗
芦苇长出金色的
思想
水草有好闻的味道

高邮湖的落日
现在看的人多
但这很多的人
心事很重
像卡在喉咙的一句话
难以言说而又意味深长
像溺水者,吞下一湖波光

高邮湖的落日
像烧红的烙铁
湖岸,有人留影
伸出手掌
轻轻地,捏住夕阳
“佛呵”,烫伤柔肠
高邮湖的落日
绕着湖底转了一圈
明朝红着脸还会回来

而许多人眼里噙
着湖水
永不相见

花儿已经入眠

当他叙说往事
证明他比往事更老
我习惯倾听
证明我已不再年轻

花气袭人的夜晚
我们喝酒
省略许多寒暄
一些往事染上酒香
一些眼神迷离动人
我们已不需要谎言
我们已不需要称颂
我们喝酒
花儿已经入眠

二胡

湖边的狗尾巴草
捏着毛茸茸的手指
编织童年许多快乐
我们曾用它制作

二胡

吱昂一声
童年溜走

秋风簌簌掠过稻田,空气里便飘来一缕甜丝丝的糯香,像是从记忆深处飘来的炊烟,带着温暖与甜蜜的回亿。

记得老家的秋收总是从收割糯稻开始的。那黄澄澄的穗子垂着头,风一过,便齐齐地点头,仿佛在应和父亲哼唱的号子。

自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每年都要划出半亩地种糯稻,因为父母知道我最爱吃黏食。

每到秋收时节,母亲总扎着褪色的蓝头巾,佝偻着腰,挥舞着明晃晃的镰刀,将金黄的糯穗一把把割下、排齐、捆紧。母亲的灰布衫后背洩出深色的汗渍,腰间的旧围裙口袋里总装着一些从地里拾起的穗头。

父亲用磨得发亮的桑树扁担,把稻把一担一担地挑到场头上。他哼唱的号子声带着疲惫的满足。晚上,他又点起一盏马灯,伴着星光,在石碾子上一个一个地

秋风里的糯香

□ 陶鸿江

攢把,那“沙沙”的稻谷声和着蟋蟀的鸣叫声。第二天太阳一出来,父亲又不顾深夜未眠的劳累,将糯稻放在打谷场上晒。为了尽快晒干,父亲不停地翻晒。

三个晴天后,稻子晒干了,父亲立即开始扬稻。当父亲用木锨扬起稻粒,在空中划出弧线的时候,阳光穿过,像撒了一把碎金。

最让我难忘的是,糯稻刚晒干,母亲就催着父亲挑上两色斗去吴堡碾米。等父亲回来,母亲立即放下手上的活,准备煮一锅糯米饭,让我解解馋。

新碾的糯米雪白如脂,香味直钻鼻腔。母亲先将糯米淘洗,看到那乳白色